

之洞奏辦的湖北「簽捐票」，往往被研究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官辦彩票，是受呂宋票的啟發而來，作者指出，張之洞在此之前已經有奏辦闈姓彩票的經歷。葉大焯則是闈姓導致科舉舞弊現象的受害者，第五章作者敘述闈姓引發的惠州科場舞弊案件時，利用《軍機處錄副奏摺》等檔案材料，盡可能還原學政葉大焯在事發後如何秉公處理的過程，認為清廷以失察革他的職已屬從輕處罰，而葉大焯為顯示自己的清白，選擇歸隱（頁175—178）。張、葉兩位官員的遭遇對比，顯示出當時社會經濟已瀕臨崩潰，作者的研究彌補了一些細節。

除了上述引人注目的特點外，該著作也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比如，主題被稀釋的問題。書名顯示其研究對象是押注科舉結果的闈姓彩票，然而除去敘述闈姓彩票產生歷史的章節外，每章都有白鴿票、花會、番攤等其他賭博形式的論述。同時，第七章所論述的華人移民賭博現象問題，並非闈姓問題的延伸，如此種種很大程度上衝淡了書名所提示的研究對象——闈姓。再如，諸多報紙媒介上關於闈姓的廣告和闈姓結果（中獎信息）的告示等信息，在流通過程中對大眾產生的影響，也是可以繼續挖掘的一個方面。

總覽全書，圖文並茂，作者挖掘諸多實物照片，呈現出具體而生動的闈姓及其他彩票的歷史面貌，幫助讀者理解並進入那段歷史。此書對於豐富學界對廣東闈姓問題的理解無疑具有參考價值。

馮玉霜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楊田，《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人類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5年，241頁。

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王村鎮的完顏村，自稱是金朝皇室後裔，為躲避「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附錄1，〈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頁327）的嚴令，以「守墓人」身分在此隱居了800餘年。隨時間的推移，完顏氏後裔不斷調整、轉換甚至重塑家族內部的集體記憶。楊田的《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人類學研究》正是以該地區完顏氏後裔的家族記憶為「社會記憶文本」，從個案角度「探討歷史記憶與現代社會語境下建構的現實關係」（頁1）。

作為一部歷史人類學著作，本書注重將傳世文獻與民族志調查相結合，試圖探尋關隴地區完顏氏的前世與今生。全書共分4章，大體以時間為序，梳理從金末至今完顏村後裔集體記憶的演變歷程，以及完顏村整體的發展軌跡。第一章主要考察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來源，以及其積極尋求官方認可文化身分的若干途徑與意義。相較於其他改姓的完顏氏支系而言，涇川完顏氏後裔800年來一直保留完顏姓氏，世代恪守家族秘密和家規，實屬不易。完顏氏後裔所形成強大而持久的家族凝聚力，是由多種途徑共同促成的，具體而言：

其一，以完顏家族祖先神「影」和「家族神廟」為紐帶，進而「重現被隱匿的漢化祭祀儀式」（頁66），使神與人之間建立精神聯繫。由於深受漢化的影響，涇川完顏氏得以長期保全族人、傳承祖先姓氏文化。其二，從原來唯一的祖先神信仰，逐步向當地西王母信仰及其他多神信仰轉變。完顏氏後裔將祖先的尚武與民間信仰相結合，使得皇甫聖母信仰承載女真後裔的家族記憶。其三，通過「金頭傳說」「祖案」「九世帥府」以及姓氏與家族，結合走訪調查與傳世文獻史料，將岐山王氏、榆中漢氏與涇川完顏氏聯在一起，從而重新整合、共享家族記憶與共同的祖先選擇。

第二章討論完顏氏世居關隴的歷史背景與女真漢化的歷史進程。作者指出，金軍領關隴一帶后，旋即派兵駐守於此，直至金末。以猛安謀克為單位的女真移民陸續到達該地區，與當地的漢人雜居、融合，至金朝覆亡之際，女真人四散而逃，涇川一帶的完顏後裔則因「深度的漢化」（頁170）而得以逃脫蒙古士兵的屠殺，繼續在當地生存繁衍。

第三章探討的是中國近現代的政治變革和制度變遷對關隴地區女真家族記憶與文化構建產生的影響。完顏氏家族宗祠從曾經的「九世帥府」，到新中國成立前後被改為集體財產，再到人民公社和「文革」時期祭祖活動的低迷與宗族組織體系的完全分解，最後到改革開放以來宗族勢力的「有限度的復興」（頁175），不斷創造新的集體記憶。2004年以後，完顏氏後裔公開發聲，宣稱自己的女真人後裔身分，並通過祭祖儀式提升家族凝聚力，進而打造一個極具特色的完顏民族文化村，在文化建構中為當地百姓帶來許多實際利益。

第四章揭示近年來完顏村的發展與變化。經過10餘年的發展，涇川完顏氏後裔的家族精英們積極建構歷史、文化與集體記憶，最終被地方政府所公開承認，逐步實現鄉村振興，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俗文化旅游勝地。與此同時，完顏氏後裔之所以要追溯已逝的家族記憶，不斷進行自我「女真化」

「滿族化」建構，目的是服務於其家族的當代利益訴求，使完顏村成為與外界溝通的一座橋梁。

通觀全書，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注重突出問題意識，在研究內容、視野及方法方面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就筆者看來，此書的學術價值至少有如下幾點：其一，突破以「漢化」代表的單向傳統敘事。以往學界多以「女真族的徹底漢化」（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5，頁338）來解釋女真人的最終歸宿。與此不同的是，本書作者揭示出，完顏氏後裔常在公開場合強調自己的漢族身分，而在私下場合裡則仍保留祖先記憶，這種「雙重生存策略」對於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歷史上乃至當下的民族交融與族群認同問題具有不少啓發。

其二，理論闡釋與現實關照的有機結合。本書巧妙地運用「物化」「神媒」等概念，用以解讀完顏氏家族信仰的物化實踐過程。作者指出，涇川完顏氏通過物化的神「影」和「皇神」（黃繩）、宗祠以及神職人員等媒介來表達子孫意志，創新性地闡釋了物質載體如何隨社會語境的變遷而被不斷賦予新的含義，以及「物與身體表達」（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114）的集體記憶如何被「選擇」的過程。作者還以「邊界—空間」模式來分析完顏氏皇甫聖母信仰中尚武與民間信仰的雜糅特質，頗具理論深度。當然，在理論闡釋之外，作者還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書中不僅考察了完顏氏後裔的歷史傳統，還關注到完顏氏家族文化的當代應用。當地政府將完顏氏家族民俗開發為旅游項目，將其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並出臺相應政策予以扶持，對完顏民俗村進行了一系列的規劃與建設，充分展現出一種「文化建構驅動的鄉村振興模式」（頁230），為探索新時代的文化認同與鄉村振興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其三，多學科方法的深度融合。本書綜合運用歷史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理論、視角和方法，較系統、全面地展現出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發展軌跡與整體面貌。作者深入挖掘了《涇川鄉土志》《岐山縣志》等地方志文獻，以及正史、碑刻、族譜等豐富的文獻材料。此外，通過深度訪談和田野調查等多種方式，翔實收集了其家族歷史的發展軌跡。作者將完顏氏後裔的當代實踐置於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把握，充分體現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路徑。作者運用了哈布瓦赫等學者關於「集體記憶」（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的理論框架，分析完顏氏家族記憶的建構；從「文化化物」的角度探尋完顏氏家族民間信仰中的人神互動；探討當地政府如何運用相對靈

活的手段，回應完顏氏後裔的利益訴求，進而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等。總之，多學科的融合與交叉，不僅為深入理解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生存策略及文化實踐提供了全方位的視野，還進一步提升了本研究的廣度、深度與可信度，為研究者帶來方法論上的啟示。

儘管本書在理論、觀點、方法和視角方面均不乏亮點，但依然存在可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一是書中部分文字表述和史料解讀有誤。如金代語境下之「內地」當指金源故地，而並非指女真猛安謀克遷往關隴地區（頁160）；僅憑《金史》中「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一條記載，便得出「創立女真文字的主要目的僅僅是為了便於官方記錄政治和外交」（頁165）這一結論，理由並不充分（天會六年時遼朝已滅，故創造女真文字為「外交」所用實無依據）；「世宗皇帝和熙宗皇帝頒政令，阻止女真人漢化以保留女真舊俗」（頁169），此處的「熙宗皇帝」當改「章宗皇帝」等。二是本書聚焦於涇川完顏氏，兼及岐山洗馬莊與榆中漢家莊等女真後裔，若能將其與其他地區的完顏氏後裔進行跨區域比較研究，或能更清晰地呈現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發展歷程的獨特性。三是全書主要圍繞完顏氏家族精英群體的文化建構進程展開，而對其家族下層成員的關注略顯不足。然而，這些微小的瑕疵並不足以影響全書的品質。該書生動地展現了在特定區域內，女真皇室後裔是如何最終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軌跡，堪稱近年來歷史人類學領域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遼宋夏金社會變遷研究」（22VRC031）研究成果]

石鵬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葉錦花，《擇利而從：明代泉州鹽場人群的戶籍策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347頁。

明代戶籍制度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但相關研究往往立足於國家視角，鮮有從普通群眾視角自下而上地觀察明代戶籍制度的演變歷史。葉錦花自研究生階段始就傾力關注明清福建鹽場的社會變遷。在田野調查中，她發現泉州地區普通群眾儘管鹽工居多，可親兄弟之間亦有鹽工、農民等身分